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的反思－ Bourdieu 文化生產理論的觀點

洪金英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中文摘要

臺灣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已近 20 年，然而方案改革的聲音始終存在，教育應該追求公平正義、促進階級流動的理想，依舊是許多學者關心的議題。本文首先進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與家庭背景、社會階級相關研究的文獻分析，進而探討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文化資本」的概念，續以 Bourdieu 文化生產理論為基礎分別從文化資本、文化與場域、文化與慣習的觀點來探討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所帶來的社會現象，文末就 Bourdieu 文化生產理論的觀點分別提出對政策面、招生端的大學及提供生源的高中雙方後續的啟示。

關鍵詞：大學多元入學方案、Bourdieu 文化生產理論、文化資本、社會階級

Reflections on the Program of Multi-Opportunities for College Entrance: Bourdieu's Viewpoint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Hong Jin-ying

Principal/Taipei Municipal Minglun Senior High School

Ph. D. Candid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 has implemented the Program of Multi-Opportunities for College Entrance for nearly 20 years. However, the voice of program reforms has always existed. Education should bring the ideal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promote class mobility. This is still a central topic concerned by many scholars.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first analyzes the class-related researches by literature review, then furth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researcher continues to discuss the Program of Multi-Opportunities for College Entrance based on Bourdieu's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nclu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culture and field, and culture and habitus.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er points out the follow-up enlightenment to the program and the universities that recruit students and the high schools that provide the source of students based on Bourdieu's Viewpoint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s: the Program of Multi-Opportunities for College Entrance: Bourdieu's viewpoin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e capital, social class

壹、前言

臺灣自 2002 年起進行大學入學制度的改革，以多元入學方案實施迄今近 20 年，方案實施方式雖歷經多次改革，但始終朝「簡單、公平」的方向改進，為實現「高中均質、區域均衡」的理念而努力（教育部，2021）。20 年來實施的成效如何？事實上「多元入學有利家境好的學生」這樣的聲音始終存在著。2016 年 8 月 21 日傍晚各大報聳動的標題「誰是臺大學生?」、「臺大學生雙北包了一半」，大學招生議題再次透過媒體而熱鬧喧騰。這一天多家媒體引述臺大社科院經濟系駱明慶教授的研究指出，兩個臺大學生就有一人來自雙北地區，而臺北市大安區正是臺大學生主要的來源地（大紀元，2016），另根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18）所公布的 106 年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指出，臺北市的 12 個行政區的所得在可支配所得總額方面以大安區最高，達 179,530 百萬元，而大安區的每戶家庭在 106 年可支配所得的額度為 1,487,679 元也是全臺最高，也就是說家戶所得最高的臺北市大安區的子弟占臺灣最高學府臺灣大學最多的人學名額，看來似乎就是家庭背景出身影響大學的入學機會，尤以進入一所明星大學更被視為是眾所矚目讚譽的學習成就。長久以來我們都期待教育體制必須具有公平正義，以免成為複製社會階級的機制，許多學者也都主張教育是促進階級流動、累積人力資本及分配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郭丁熒，2010），但是家戶所得最高的地區產出最多明星大學的錄取生，這些全臺菁英錄取生在出社會後也是最有競爭力、最容易出人頭地的一群（王振輝，2013）。以「簡單、公平」為改革方向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 20 年，真的有益於促成階級流動或階級翻轉的教育目標嗎？這引發本文欲探究的動機；而談到社會上的階級流動或階級複製，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觀點是常被引述的理論，本文遂以 Bourdieu 文化生產理論的觀點來探討。

貳、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與成效現況

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簡介

過去以大學聯考成績分發為各高中畢業生升學的唯一管道，教育部於 2002 年開始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2004 年整併多元管道為「甄選」及「考試」入學兩大管道。甄選包括個人申請與學校推薦兩種管道：申請入學生須準備個人備審資料傳送所欲申請之大學審查，學校推薦則由所就讀高中以在校成績推薦進入大學，甄選入學係避免以單一智育成績作為升學的標準，考試入學則延續聯招以考試取才的公平性。大學多元入學的考試與招生採兩階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為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以此成績進行大學甄選入學的檢定、篩選和參採工具，未錄取或放棄者可續參加第二階段指定科目的考試；第二階段為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則以此考試成績選擇志願填卡後進行各大學的統一分發入學（教育部，2021）。

在 2005 年，教育部公布獲得 5 年 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所頂大學校中，除擴增大學招生名額外，也必須提高甄選入學的比率，遂自 2007 學年度新生入學起辦理大學繁星計畫，大學繁星計畫係由高中向大學校系推薦符合資格的學生，大學則要提供各地區學生適性揚才之均等機會，各大學錄取同一所高中畢業學生至少一名，此一繁星計畫與之前的學校推薦入學管道也因之逐漸整合成繁星推薦入學管道；2011 年甄選入學正式定案包括有個人申請入學及繁星推薦入學，繁星推薦入學係合併學校推薦與繁星計畫兩個管道而來；至此，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分為三：考試分發入學、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其中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合併稱為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將各高中學生在校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視為等值，凡通過大學各學系之學科能力測驗檢定標準者以「高中在校成績百分比」作為優先排比順序，百分比小者優先為大學所錄取，各大學並保障各高中至少錄取一名學生（教育部，2021）。

為改善多元入學制度較難鑑別部分如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之學生，並有利於大學錄取該類真正有潛力與才能學生（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子女、實驗教育學生、持有 ACT 或 SAT 等國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教育部又從 2015 年開始至 2017 年以單獨招生方式試辦「大學特殊選才招生計畫」，並自 2018 年度起正式將其納入多元入學管道實施（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21）。

配合 108 學年度中小學新生將適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普通高中課程架構朝向減少共同必修、增加適性選修、適性分組的差異化課程、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與學生自主學習的彈性課程方向規劃，未來大學招生勢必不能僅依賴共同學科考試成績作為選才標準，因此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 111 學年度起將以「申請入學」為主要招生管道並強化「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方式選才，除入學考試成績外，將更重視考生在校的修課歷程及多元表現。多資料參採的學習歷程是哪些呢？學習歷程由教育部建置中央資料庫，開放各高中及學生上傳，項目有四種：一是學生「基本資料」包括學生在校所擔任班級與社團幹部等紀錄；二是學生高中在校的「修課紀錄」包括修課內容、成績；三「課程學習成果」是學生每學年所修習各類課程所完成的作業、作品成果等，要經老師認證、每學年至多勾選六件；四是「多元表現」包括學生參加競賽、檢定或彈性學習成果，每學年至多勾選十件（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21）。

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與家庭背景、社會階級的相關

陳建州、劉正（2004）在多元入學剛開始實施時就研究多元入學方案之教育機會均等性的議題，他們指出多元入學方案是將舊制聯考的一次篩選分成多次進行，篩選者與篩選地點也由校園外延伸至校園內部，致使篩選過程與依據皆可能被社經地位優勢者所影響。田芳華、傅祖壇（2009）則蒐集臺灣在 2002 年第一

屆全面正式實施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下的十二所大學一年級學生資料進行研究，分析不同入學管道之大學生社經背景差異並比較其學業成就，研究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較高者經由個人申請管道入學之機率較考試分發入學的機率高，該研究也顯示，母親受教育年數的多寡會影響其子女進入一般大學的升學途徑（田芳華、傅祖壇，2009）。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則是研究學校 2003 年入學與其 2006 年大四將畢業時的學生資料，結果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出身私立高中最有助於甄選入學，在不同管道入學者以考試分發者的自我學習或校系認同的滿意度為最低（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張宜君、林宗弘（2015）解釋家庭背景社會階級影響大學多元入學時指出，優勢階級子女多就讀教學資源充裕的公立大學並進而增加就讀研究所機會，但中、下階級家庭子女則更容易進入教學資源較缺乏的私立大學，因而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機率也較低，可見臺灣的高等教育雖已陸續擴充但幾乎沒有改變既有的階級複製（張宜君、林宗弘，2015）。葉高華（2018）以南部的國立中山大學的學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大學多元入學的非考試管道（指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最有利鄉下的高社經家庭，以中山大學為例，該校繁星生來自基層的比例與整體臺灣社會結構相近但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則常容易收到高社經家庭的子女，而低學歷者（國中以下）的子女都很難進入該校，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則非常容易收到高學歷者的子女，繁星推薦也容易收到低所得區的學生，但考試分發最容易收到高所得區的學生（葉高華，2018）。

要看家庭背景、社會階級與大學多元入學不同管道的關係其實從實施多元入學以前的資料、加上長期資料的追蹤更能比較不同入學管道前後及彼此間的變化。事實上前面所言，臺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在 2016 年以前也公布了臺大學生從哪裡來的研究，當時駱明慶（2002）是以 1954-2000 年臺大學生的學籍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外省籍、父母具大學學歷、父母為公務人員、及居住在臺北市成為臺大人的機率較高；臺大的駱明慶教授於 2016 年初發布誰是臺大學生之續集，以 2001-2014 年臺大學生的資料進行研究，這篇論文明顯與前面研究不同的是比較了不同入學臺大管道學生的來源背景，論文並且在兩年後正式出版，指出繁星推薦確實有將臺大學生來源往平均所得較低的鄉鎮市區分散的效果，使高中畢業學校集中度與居住縣市集中度下降，換言之使臺大學生的高中畢業學校總數增加（駱明慶，2018），這個研究結果也在戴其安（2016）的研究得到支持，戴其安是以 1991~2015 年間的臺大學生學籍資料進行研究，結果指出臺大學生的高中畢業學校數增加，主要原因是大學多元入學管道的繁星推薦、廣設高中政策下高中校數增加、外縣市人數增加等原因造成（戴其安，2016）。巧的是同樣也是明星大學的政治大學也有學者有類似的研究，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使用 1994-2012 年政大學生入學資料研究學生家庭社經地位、高中來源與入學學測成績三方面的表現，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是否會使學生有越來越來自菁英家庭的趨勢，結果顯示多元入學管道的擴張對中、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生的入學具有正面影響，且有助於非明星高中學生入學，整體來說，大學多元入學並沒有造成政大

學生越來越傾向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或明星高中的結果（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此外，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指出，自 2015 年起各大學提出保障弱勢學生升學的扶助弱勢計畫，若弱勢學生通過甄選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其錄取率高於一般生，在頂尖大學的中低收入學生通過 1 階後，2 階錄取率比一般生多 10 個百分點，低收入學生則比一般生多了 6 個百分點。

綜合以上的研究分析可見，家庭背景與社會階級在臺灣的確會影響學生大學入學的結果，但是這樣的影響已經受到重視，2011 年定案以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作為大學多元入學的三大管道就是企圖把家庭背景與社會階級對大學選擇的影響降低；而各大學於近三年保障弱勢學生升學的扶助弱勢計畫又更保障弱勢生的大學進路發展；就上述以許多學校（臺大、政大與中山等）學生背景所進行的研究也顯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也正逐漸降低家庭背景與社會階級對大學選擇的影響。為解釋社會階級、家庭背景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間如何相互構建，許多研究紛紛引用當代法國著名的教育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加以解析；接下來即就 Bourdieu 的理論進行探析。

參、Bourdieu 的文化生產理論探析

Bourdieu 從研究文化社會學著手，結合藝術、博物館、攝影、教育等文化活動的研究，建立再製理論的體系，從文化的觀點探討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認為文化是影響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Bourdieu 以「文化資本」的概念描述人們對於上層階級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所能掌握的程度，使用慣習、文化資本、場域等概念來分析文化活動與教育成就之間的互動情形，以下介紹 Bourdieu 理論的幾個重要概念：

（一）慣習（habitus）

慣有習性在 Bourdieu 理論中的用語就是慣習，慣習是經過培養而來的特質、傾向、氣質（dispositions）與處事的方式，使行動者在各種各樣的場域做出實踐的表現，這些實踐表現在臨場應變及不斷創新情形下足以與挑戰相互回應配合，是人的習慣性行為的方向，氣質、傾向、習性或愛好等都可視為是慣習的同義詞（Bourdieu，1989，轉引自周新富，2005）。個人在日常生活表現的偏好、傾向、行為模式與風格、品味等都是慣習所造成的。慣習的造成源於（周新富，2005；楊茜評，2009）：

1. 個體和集體的歷史經驗：是個人本身及其所存在的集體所累積產生，因此慣習是歷史經驗累積的沈澱物，並且內化為心理結構的持久系統。
2. 外在社會結構的特性所造成：所處的環境場域有一定的特性，個體處於其中

不知不覺會為自己生存的社會環境客觀條件所制約，譬如長久處在宗教場域的孩子就會形成宗教氣息的特性，這是源於外在社會結構的特性所形成的慣習。

3. 社會化機構所造成：社會化的機構如家庭、學校等，這對個體慣習的形成更具影響力，孩童往往承襲家庭上一代的觀點來看世界，這是來自家庭的慣習；之後又以學校所習得的經驗架構為基礎加以轉化成為以後經驗的基模，這又是來自學校的慣習。
4. 個體的實踐活動：這是指個體自己個人所創造的結構所導致的結果，如喜好藝術創造的人所產生所實踐出來的活動也會有產生出來的特性，這就是透過個體實踐活動所產生的慣習。

(二) 資本 (capital)

是具有生產力的資源，人們在一定場域、在某種位置、利用某些資源展開實踐行動，擁有資本的人很容易有機會在短時間得到許多金錢，因而改變其社會地位，所以資本是產生報酬和再製目前狀態的一種潛在力量，但是資本需要時間累積，非短時間可擁有（周新富，2005）。資本的類型有（周新富，2005、2008；鄭文鵬，2014）：

1. 經濟資本：主要是指金錢或是相當於金錢的資本、這是可轉換為金錢形式存在的東西、最容易理解的經濟資本的例子就是個人的財富。
2. 社會資本：指由社會關係所構成而形成的制度化互動關係的網絡，逐漸累積而形成的資源總和，通常社會資本就是指人際關係所帶來的資本。
3. 文化資本：指一個人的教育、學歷、品格、知識、語言、思考模式、行為習慣、價值體系、生活風格或慣習等組成的形式文化財等屬文化資本。
4. 象徵（或符號）資本：指依附在前述三種資本下可以轉換的資源，這類資本可予以制度化而轉換成經濟資本的形式。

(三) 場域 (field)

場域是代表社會空間的概念，這是行動者在社會空間所處的位置及因其各種所處位置彼此間所組成的網絡與結構，在此空間行動者會因而有主客觀的地位或權力所帶來的不同的資本，在這樣的空間會有其特定的、必然的、及其與其他場域不同的運作邏輯，整個社會就是由這樣分化但相對自主的小社會所組成，如社會裡有藝術的場域、宗教的場域、運動的場域...等（周新富，2005）。場域的特性包括是源於衝突和競爭所發展出來的、是權力競爭的場所、是相同於經濟活動的市場體系、是行動者的遊戲場域、在不同場域間的支配與被支配者有自己的再生機制（如協會理事長的產生方式等）與相互滲透性（如賣畫的行為，是文化場

域滲透到經濟場域)。場域所代表的是行動者網絡關係的表現、是資本轉換的場所、也是權力競爭的場所(周新富, 2005)。

(四) 文化再製理論

以上四者如何形成文化再製?就 Bourdieu 的觀點,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乃是構成社會階層化的兩個主要原則。在教育場域中文化資本最重要,文化資本與象徵經濟資本的階級有相當大的關係,文化資本有三種形式:第一是具體化形式的文化資本,指以精神和身體等形式所呈現於外的慣習,如服飾、語言談吐所呈現的氣質;第二是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指文化商品的形式,如藝術的畫作、書籍、辭典、工具、機器等所帶來的文化資本;第三是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資本,如教育文憑所帶來的保障的認定。家庭是傳遞文化資本最重要的場所,家庭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慣習也是具體化形式文化資本最具體的例證,包括家庭所帶來長期「社會化時間」的投入、家庭成員(父母)的關心、陪伴、督促等及行動者本身在家庭可以自由運用投入進行的自我教化,及家庭擁有的文化財與文化媒介等。不同社會階級的兒童所能獲得的文化資產並不相同,主要是源於出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家庭可視為是場域的一種,場域是整個文化再製機制進行的「場所」,場域中的參與者各有不同的慣習,慣習同時受主、客體因素所影響,而帶著不同慣習的各方參與者在各個場域中競相爭取的標的物就是「資本」,教育場域中尤以「文化資本」為代表(吳耀明, 2004)。Bourdieu 並將文化資本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相互影響建構,認為家庭對於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主要是透過文化資本來發揮作用,包括習慣、品味等長久而來的慣習、性情或秉性,也包括有形的書籍及文化物品等資本,以及制度帶來的文憑證照等,高社經地位的家庭能夠將自身擁有的經濟資本轉化成為文化資本,提升子女的學業成就與教育機會,將親代的優勢透過資本的移轉而延續。而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更是透過學校的教育制度形塑而來, Bourdieu 在其理論論述中批判上層階級所代表的主流支配文化常被統治者所認同而變成學校教育場域的一部分,舉例來說,學校課程知識充斥社會階級權力分配與控制,探究其內涵及屬性可見學校教育機構所傳輸的文化接近並契合統治者的支配文化(郭木山, 2012),像是學校教育所使用的語言、強調的價值、教科書呈現方式等都是宰制學校教育的過程,也是造成文化再製、形成階級複製的理由,這樣的過程也變成是場域內所有的行動者所認同,也就是玩家默認的一套遊戲規則,使所有的遊戲規則「合法化」,其實也形成了象徵性的暴力(吳耀明, 2004; 周新富, 2005)。

肆、從 Bourdieu 的文化生產理論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

一、從文化資本的觀點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

Bourdieu 認為文化是影響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透過家庭文化資本的作用，高階層的家庭可以得到有利於學校學習的文化，因而在教育的生涯中得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其他階層來得大，也就是說，社會階級直接影響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直接影響教育成就、教育成就再直接影響職業地位（周新富，2005）。從 Bourdieu 這樣的觀點來看，住在臺北市大安區的孩子文化資本最豐富、其教育成就也最高，最容易進入臺大與政大，而其未來的職業地位也最佳，這也正如張宜君、林宗弘（2015）的研究觀點所說的優勢階級子女多就讀教學資源充裕的公立大學且就讀研究所機會多而中下階級家庭子女則更容易進入教學資源相對較缺乏的私立大學，因而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機率也較低，這也可能造成其後續的職業地位也許較低下，進而造成 Bourdieu 所謂文化階級的複製；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家長可能多具備高等教育或成功專業能力，較能介入學校運作，人脈中也不乏老師、教授等教育工作者，也會訓練自己小孩採取類似作法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資源與機會，把家庭的文化資源轉換為孩子在教育場域中的優勢；但是勞工階級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較低，其人際網絡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多只限於等待學校所給予的資源。可見不同階級的父母因為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的落差，對於子女學習的方式及與學校互動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產生的教育效果就有所不同。從駱慶明（2002）早期的研究就可以看出這種結果，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偏好上層階級的語言型態，無論生活、思想、行為、價值觀等模式皆為守護上層階級，而過去單一以考試選才，考試所用的語言、出題的內容與範圍皆來自教科書與學校場域，其實就是淘汰低、下階層學生，保護中、上階層孩子。若大學招生持續無所改革，可能大眾就會誤以為大學聯招考試是公平且唯一的，若如此豈不就是 Bourdieu 所言「誤認象徵性暴力的合法性與理所當然」？然而在教育部區域均衡理念的支持下，大學招生有了制度性的變革，納入更多選才依據面向，這樣的多元入學方案相較過去聯考制的唯一入學管道取材就研究資料分析，其實並沒有造成許多頂大學生越來越傾向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或明星高中的結果（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駱慶明，2018），較明顯的改變可從以下管道分析：

（一）就繁星推薦入學管道的推動而言

教學資源豐富的頂尖大學也招收平均所得較低的鄉鎮市區的生源，這使得頂大的學生高中畢業學校居住區域擴增（駱慶明，2018；葉高華，2018，可見這是企圖翻轉某些階級不斷複製的作為。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也企圖為文化資本較低（如低所得社區）的孩子製造機會，因而有保障各校（不論學校所在位置、家長社經背景與學校成績等）在校成績等值、至少錄取一名學生的繁星推薦入學管道，

因而使得不少僅能依賴學校場域提供文化資本的孩子有了翻轉的機會；然而，教育制度對這種現象的改變還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我們所能看到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影響也只是些微而且緩慢，原因之一也許是繁星推薦入學名額仍有限（百分之 5 到 15），而名額無法擴大的原因也許正也是 Bourdieu 所謂該場域（招生的大學）行動者的慣習，依舊維持著大部分的好學生來自都會社經背景佳的地區的習慣性思維而不願意或不放心開放更多名額。

（二）就個人申請入學管道的辦理而言

來自高社經背景家庭、母親的教育程度高與出身明星私立高中的學生最有助於甄選入學方案的個人申請（田芳華、傅祖壇，2009；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葉高華，2018），仔細研究個人申請入學管道的條件，需要通過學測考試的檢定、提交備審資料、參加指定項目的面試或現場實作考試，依照 Bourdieu 文化資本的說法，有可能因為高社經背景家庭從小提供多種文化刺激，而許多私立學校也著眼於多元學習資源的提供等，這些訓練對於個人申請入學者較為有利；而母親的家庭角色也較為重要，一般而言，家長關心子女升學，自會影響子女選填志願的學校和科系，這也是符應 Bourdieu 家庭是提供孩子文化資本的重要場域的觀點，母親在家庭中和子女互動可能較為密切，而教育程度高的母親資訊獲取和吸收較為容易自易有助於子女備審資料與面試的準備。因此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 Bourdieu 所批判的文化再製觀點則應是後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改革所應注意。

二、從文化與場域的觀點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

根據 Bourdieu 所言，學校其實也是一種競逐資本的「場域」，一方面匯集了眾多資源，孩子進入一所資源豐沛的明星大學便是在社會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孩子也透過明星大學建構本身的文化資本；而學生透過明星大學所快速積累大量有用的社會資本如人脈等更有機會在其離開學校之後繼續擁有相關資本而得到支持，優勢階級也能更進一步藉此鞏固而完成「階級再製」的任務（王振輝，2013）或者另一階級也有可能因而「階級翻轉」；大學多元入學招生制度肯定這種場域學習的重要，因而有了繁星推薦入學造就偏鄉學子的入學機會，其理念想法就是一旦來自偏鄉（文化資本較低）的孩子取得臺大、政大等頂大的入學機會，經過四年這些明星大學場域的學習，就有可能擁有更多文化資本，甚至是社會資本（如人脈），因而進行社會階級的翻轉，就此觀點而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設計也是符應 Bourdieu 所謂場域與文化的觀點；然而，繁星（計畫）推薦一來生源較少，再者自 2007 年實施至今不過十餘年，誠如許多教育社會學者所言，理論與實踐均需深植於社會脈絡裡，因此以法國的社會與文化為基礎所進行的研究所形成的 Bourdieu 理論，在遇到當前臺灣經濟、社會與教育現況會產

生何種互動結果、而在大學多元入學的脈絡下彼此間又會如何互動則也是尚有待觀察。

三、從文化與慣習的觀點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成效

Bourdieu 所謂的慣習是行動者經過培養而來的氣質，是在場域裡長久浸潤習得，個人出身不同家庭背景，透過父母傳送的知識訊息，直接或間接傳遞其階層的語言思想、價值觀、世界觀等，經過教化之後會內化形成該階層特有的慣習，不同的生活模式和語言也都反映出階級的不同，個人進入學校，學校又是慣習養成的一大場域，但是他批評學校是保守的暴力，學校教師的教學語言亦是特殊場域的情境產物，受到場域內的價值性、合法性等原則來支配與控制，Bourdieu 認為高等學校教育偏好上層階級的語言型態，無論生活、思想、行為、價值觀等模式皆為守護上層階級，就此觀點而言，目前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中多數仍保有考試成績的檢定（學測成績）或錄取成績（指考成績）的標準，其實仍就是淘汰低、下階層學生的機制，而佔最多招生人數的個人申請入學管道，在其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中更容易形成保護中、上層階級的機制，此一甄試需仰賴招生學校的大學教授的評審，則評審就有可能錄取上層階級的考生；根據葉高華（2018）與田芳華、傅祖壇（2009）等人指出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命題）常容易收到高社經家庭或母親關心子女教育的子女，可見學校的篩選機構常只是承認那些遵從學校文化的人，再以此方式複製教育系統本身，不知不覺也就忽視學生原先文化的不平等，再者，出身高階級家庭的子女所流露出學術表現上的從容高雅的姿態，自然表現得體與品味、氣質都是有利於作為學術機構的大學所篩選的條件；至於考試分發的管道，其命題語言、趨勢、取材範圍也有類似的狀況；反觀繁星推薦的大學入學管道則以高中在校成績為主要篩選條件，這是各考生在自己所屬原高中另一場域的慣習比較，其慣習會因學校所處背景不同而有不同，一般而言社區型高中或是一般中小學型學校教育亟欲培育的價值、信念與習性與中產階級家庭日常生活所實踐的文化是較為契合的，這也許也是葉高華指出（2018）繁星推薦也容易收到中低所得區的學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伍、結語

學校是僅次於家庭能為學生提供較多文化資本與慣習養成的最重要場域，據此學校應該盡可能給予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相同的成功機會，與大學多元入學最有相關的學校是招生端的大學與提供生源的高中，111 學年度的大學多元入學因應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將又是另一新紀元的開始，許多改革措施已因應公布，納入高中階段的學習歷程檔案就是最受矚目的變革之一，反思過去與前瞻未來，Bourdieu 的理論觀點可以帶給我們那些啟示呢？

（一）就政策面而言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納入特殊選材、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四個管道，的確具有多元、兼顧異質、照顧弱勢的特性，企圖以教育制度翻轉社會階層再製的不合理現象，此一理念方向是有助於階級流動與改變的，但是影響成效些微且緩慢，特殊選材與繁星推薦管道的招生名額尚在少數，若能使各高中達到「均優質且區域均衡」，相信各管道招生名額或是錄取名額也會翻轉；此外個人所選擇的升學路徑與結果，也有可能是在考量經濟條件之後所作成的決定，而非全然受文化資本的影響，因此為給予弱勢學生提供就學的經濟支持也應納入考量，經濟資本的提供是最實惠有效的方式。

（二）就大學招生的角度而言

1. 應建立公開明確的未來學習歷程檔案審查的評量尺規

大學多元入學以甄選入學的申請入學占招生名額的最大宗，過去在考生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備審資料的審查過程中到底是以什麼標準決定備審資料的優劣，一直受考生和家長不解，111 學年度起備審資料改為學生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的檔案，那大學端審查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規準是否只有利於能製作多元豐富資料的考生？能製作多元豐富資料的考生是不是以上層社會階級者為多？因應即將到來的 111 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的制度，建議各大學應深入分析學生學習歷程資料的內涵並與高中教學現場深入對話彼此理解，進而建立公開透明的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尺規，一來有利於高中端的教師教學與學生的積極學習、再者也可供大眾檢視其評分項目是否兼顧多元文化與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學生。

2. 可簡化申請入學招生流程以降低弱勢學生準備的壓力

大學入學的管道多元，以目前占招生名額最大宗的申請入學而言，學生常為掌握不同的機會而常需要準備多樣多元資料致需要參加各種競賽、營隊活動等，對文化資本弱勢的學生相對不利，因這些多元活動常須收取費用或因學生所在位處偏鄉而苦無參加機會，當然對大學入學也造成不利影響，近年許多大學在申請入學名額提供保障弱勢學生升學的扶助弱勢計畫，提出弱勢生於通過 1 階段篩選後可免面試及許可入學的機制；而在特殊選材方面，也有不少大學提出弱勢生的保障名額，如臺灣大學希望入學、清華大學拾穗計畫等，這些都算是簡化招生流程對文化不利學生的友善計畫，可為方案的改進方向。

（三）就高中教育的角度而言

1. 檢視並建立學校評量機制的多元化與標準化規準

在臺灣目前實施多元入學方案的制度下，除了考試分發制度，無論學校推薦或是個人申請的升學管道，學生高中在校表現、資料審查與面試都是主要的錄取依據，學校所採用的評量機制是否也如 Bourdieu 所言有利於社經地位優勢、文化資本較高的家庭？而在 108 課綱實施後 111 學年度起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又要採計學生在高中學校的學習歷程檔案，我們的學校評量機制是否有給予學生多元表現的機會？是否有提供不同文化背景學生都有機會？而評量有沒有一致的規準？或又只是崇尚主流文化價值？是不是只重視傳統學科的重抽象、尚紙筆之內容？或評量方式是否應有所調整？學校教育，尤其是社區高中，的確有責任致力於讓中低階級子女也有向上流動機會。

2. 盡量提供資源提升家長及學生的文化資本

學校可以辦理各類親職教育活動與各種文化活動，如演講、博物館參訪等以提升家長文化資本，學校也可以扮演社區文化中心的角色，開放學校的資源，如學校圖書館、球場、演藝廳等，以提供社區及家長學習成長的機會，藉此，提升家長及學生的文化素養，消弭家庭與家庭間在文化資本上的差距。在大學多元入學的輔導措施中，許多學校會積極提供大學教授進入學校開課、辦理學群探索與體驗課程、舉行模擬面試、針對備審資料或學習歷程檔案積極輔導以改進並提升其品質，甚至陪同學生不斷練習檔案製作與面試表達、儀態姿勢等，其實也都是提供學生文化資本的積極作為。

參考文獻

- 大紀元（2016）。**臺大學生從哪來？北市大安區最多**。取自<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8/21/n8222771.htm>
-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21）。**多元入學方案（111學年度起適用）－大學考招架構**。取自<http://www.jbcrc.edu.tw/multi3.html>
-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甄選入學過篩後，弱勢生錄取率高於一般生**。取自<http://www.jbcrc.edu.tw/documents/news/20190310%E6%96%B0%E8%81%9E%E7%A8%BF.pdf>
- 王振輝（2013）。**明星學校夢：從教育場域看臺灣的階級再製**。*靜宜人文社會學報*，7(2)，1-33。

- 王雅玄、陳靜盈（2012）。多元升學制度下的菁英生產：貴族習尚之學校實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2)，85-122。
- 田芳華、傅祖壇（2009）。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1)，209-233。
-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多「錢」入學？從政大學生組成看多元入學。經濟論文，44(2)，207-250。
- 吳耀明（2004）。從再製理論看學校教育的角色。臺灣屏東：屏東師院學報，21，217-242。
- 沈游振（2003）。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30(11)，93-120。
- 周新富（2005）。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臺北：心理出版社。
- 教育部（2021）。部史全球資訊網：重大教育政策發展歷程：多元入學。取自<http://history.moe.gov.tw/policy.asp?id=3>
-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續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85-129。
- 郭丁熒（2010）。何處有塵埃？~學校教育不公平之探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6(3)，30-61。
- 郭木山（2012）。學校課程知識—階級再製的隱形篩網？教育學誌，27，1-37。
- 陳建州、劉正（2004）。論多元入學方案之教育機會均等性。教育研究集刊，50(4)，115-146。
- 葉高華（2018）。大學多元入學是否有利「家境好」的學生？。臺灣社會學刊，64，171-195。
- 楊茜評（2009）。Bourdieu 的文化再製意涵與其在學校教育上的啟示。北縣教育，66，44-48。
- 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由大學多元入學者的個人背景與滿意度

評估多元入學的成效。《應用經濟論叢》，98，1-53。

■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18）。中華民國106年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取自<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Y3L3JlbGZpbGUvNDU2NzIvNzk0MDA4NC9hODIzZGFmYS0wNmFiLTRkMWItODNiZS02NmJiZGVhODMxYTkucGRm&n=MTA25bm06Ie65YyX5biC5a625bqt5pS25pSv6Kiq5ZWP6Kq%2F5p%2B15aCx5ZGKLnBkZg%3D%3D&icon=.pdf>

■ 駱明慶（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 駱明慶（2018）。誰是臺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經濟論文叢刊》，46(1)，47-95。

■ 鄭文鵬（2014）。文化資本影響學業成就機制之研究：以臺灣地區為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臺北。

■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llier.

